

从“险学”到“显学”： 蒋介石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张宪文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蒋介石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是学术研究的禁区,人们不愿涉足。改革开放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史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渐趋客观,对蒋介石早年的革命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政后实施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坚持抗日战争、丢失大陆的原因,以及败退台湾后对台湾发展的影响和对大陆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几年,蒋介石研究成为两岸学术界和社会上关注的热点,如何把这一研究活动引向科学的发展道路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关键词: 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 《事略稿本》; 大溪档案; 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1) 08-0227-07

近几年来,民国历史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成为社会上广泛关注的热点。各类书刊、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作了描述,其中,真真假假,难辨是非,用蒋家后裔蒋方智怡的话说“我们是直接的受害者”。而网上对蒋的评价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这种现象的出现,提示历史学者应加强蒋介石的科学研究,厘清基本的史实,并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和评述,同时也帮助年轻朋友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这在当前看来已显得十分重要。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领导者,他的言论和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并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曾有过合作,但较长时期是处于你死我活的尖锐对抗状态,因此,对蒋介石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1949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这样的政治和战争环境中,不可能给蒋介石以客观的历史评价。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很长时期,蒋介石研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大的禁区。虽然有一些关于蒋介石的出版物,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恽逸群的《蒋党真相》,荣孟源的《国贼蒋介石》及其他一些小册子,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宣传性的读物。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受制于上述陈伯达两本书的政治影响。在那个年代,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向人们描绘的蒋介石形象是被扭曲的,甚至是被丑化的,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学者们更不愿意涉足这一领域,人们对蒋介石缺乏真实的、完整的了解。

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揭开了对中共党史人物拨乱反正的序幕。中共党内开始重新评价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贡献。位于天安门左侧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调整历史陈列后,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陈独秀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时的作用,就连林彪在战争年代的作用和贡献也给了一席之地。众所周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科是“四人帮”搅乱的重灾区。改革开放使历史学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

1979年,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宾馆举行了全国性的制定历史科学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学术工

作者简介: 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史。

作会议。当时各地老、中、青三代史学工作者约二三百人出席，是载入史册的一次重要的历史学工作会议，也是众多老一辈历史学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后最后一次大聚会。会议的中国近现代史组制定了一批研究规划，其中包括若干项民国史方面的研究课题。这个组有两个问题今天仍值得一提：第一，民国史的敏感性尚未消除，有人仍存在疑虑。会上，一位上海的著名史学家“打横炮”，提出开展民国史研究是哪个司令部指示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提问引起了与会学者思想的混乱。因为该学者听说江青在1972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支持开展民国史研究。此事经出席史学规划会议的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思白研究员详细解释，指出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出的号召，江青只不过表示支持罢了。这样才使出席规划会议的学者们思想稳定下来。第二，会议在国内首次制定了“蒋介石研究”这个课题。本人作为南京大学出席会议的代表承担了这个项目。会上学者们建议，今后要加强蒋介石的研究：浙江省可以着力研究蒋介石青少年时代，上海研究蒋介石在上海的时期，而南京则重点研究国民政府时期。这样一个分工，是考虑到地域背景和当时蒋介石研究面临的现状：第一，社会上对蒋介石的出身仍受传记小说《金陵春梦》错误说法的影响，需要加以厘清；第二，在陈其美逝世后，人们对蒋介石在上海的私生活、人际关系和证券交易等，有一些错误的解读，需要给予客观评述；第三，当年蒋介石投入孙中山革命队伍，是否投机革命，需要从事实出发加以科学论述。

开展蒋介石研究，除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科学的思想观念外，还应掌握大量的最基本的史料。在这里，首先需要提及两件事，其一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指示编纂《蒋介石全集》，具体时间不详。在那个时代，只有毛泽东才能作出这样的决策。据“文化大革命”后该全集的编者荣孟源告诉本人，在编好第一卷尚未出版时，因“文革”到来而流产。其二是为了开展史学“六五”规划项目“蒋介石研究”，决定先搜集、整理蒋介石的相关资料。1980年代初，经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南京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编纂《蒋介石文选》，并由我来主持。工作进行了两年，在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大学等单位，查阅了大量有关蒋介石的文献资料，但编纂工作很快停顿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选材难度大。现在回过头来思考，当时客观上编纂时机并不成熟，但也反映出我们有一定的学术勇气。

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先后出版了一些蒋介石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是直接材料并不多。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这部年谱稿是毛思诚根据蒋介石早期日记、家书、致友人信函和其他相关材料编纂而成的，其中保存有蒋介石删改的笔迹。后来1936年第一次出版时，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它是研究蒋介石的基本史料之一。其他相关资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等。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收藏有1949年前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文集、文选、全集、书信集及早期日记等，这些都是研究蒋介石的重要史料。它比后来经过加工删节整理出版的一些言论集，保持着更多的原貌。如朱亮基编辑的《蒋介石言论集》（中央图书局，1927年）。据编者在“编例”中说，蒋介石的言论当时“尚无专集刊行”。该书“大半是同志从黄埔军官学校寄来所记录先生（指蒋介石）演说时的底稿，并湘（湖南）中同志寄来的文件，间有在报端抄录者”，其内容包括“对于党员的言论，对于民众的言论，对于学生的言论，对于军界的言论，对于工界的言论，对于海外侨胞的言论，对于外交的言论”。该言论集最珍贵之处，在于它出版于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之前，其中收录的讲演、文章反映了蒋介石的一些真实言论，即联合共产党，实现国民革命。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认识有一个演变过程。^①这与蒋介石后来对共产党的言行有很大差异。

① 作者曾写过《试析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

台湾保存的有关蒋介石的档案史料比大陆多，特别是收藏在国史馆的蒋中正档案（即俗称的“大溪档案”）内容十分丰富。近20年来，随着两岸学者往来和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和研究著作，也更多地进入中国大陆。如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卷）（1984年），这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规模较为宏大的蒋介石文集，内容包括论文、演说、文告、书信、各类函电等。由日本古屋奎二编著的《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15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87年），其最大特色是引用了较多的蒋介石日记。据作者自述，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给他们开放查阅蒋介石日记，这在当时来说是罕见的。此外，还有蒋经国的《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1年）、蒋经国的《我的父亲》（台湾正中书局，1976年）、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日记》（台湾三民书局，1976年）、陈布雷等编《蒋介石先生年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与蒋介石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献汇编有：罗家伦、秦孝仪等主编的《革命文献》（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53年至1989年）、台湾国史馆于1972年整理、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的《国民政府公报》（1987年）等。秦孝仪主编了《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8卷12册），1978年10月印行。本书最初未公开出版，但已在台湾学界、政界中流传。内容运用大量史料记述蒋介石1949年以前之活动，其中引用不少蒋介石日记。近几年流入大陆最重要的蒋介石研究史料，应该是由台湾国史馆印行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目前已经出版至第47辑。据该书“序言”介绍，“《事略稿本》系蒋氏的秘书参阅相关函电令告及节抄蒋氏日记，以仿《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编撰而成。起讫年代，自1927年至1949年……总计274册”。本人认为，《事略稿本》系蒋介石身边人员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整理编纂而成，数量多、内容丰富，极具史料价值，而当前尚未引起两岸学者的高度重视。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几部蒋介石的传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以及由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这几部书都是由中华民国史研究学者编著的，应该说比当今社会上流传的那些传记文学类的蒋介石生平出版物要严谨得多，史实也可靠得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几部书对蒋介石的评述逐步摆脱了“左”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比较客观、公正。当然，也不可否认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重大缺陷，即著作编纂出版时有关蒋介石的原始专档、日记（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都还未开放，史料运用上明显不足，有些问题说不清楚，这在当时来说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来，蒋介石研究走过了曲折艰难的道路，总的趋向是距离人物的真实面貌越来越近，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因而研究也更加放开。蒋介石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的呢？我认为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学术界从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从贬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否定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转变到大力开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活动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有重要意义。文件指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团体，工农商学兵和海外侨胞，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这段话完整地、全面地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各方面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比较容易为海内外各方面人士接受。

在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上，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与理论研究的胡乔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84年，他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要改变其抗日战争馆只陈列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现状，要全面反映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国共两军共同抗战的史实。他作了长篇讲话，指示在北京卢沟桥地区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是在胡乔木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开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人民日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发表的一版照片中，有一张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后走出会场的照片。照片的说明大意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日的谈话”（指蒋介石关于“最后关头”

的讲话)。毛泽东当时即肯定蒋介石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①。《人民日报》在1949年后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刊登蒋介石的照片,对引导人们正确评价蒋介石和抗战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我们发表了《简论台儿庄战役》(《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这在当时来说,是第一篇全面论述正面战场战役的论文。之后,我们又编著出版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的论著,运用大量第一手军事档案全面论述了正面战场22个大型战役。1985年10月,我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在推动民国史研究以及配合当时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改革(中共党史课程改为中国革命史教学)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1986年,《瞭望》海外版以“对蒋介石的新评价”为标题,发表了对作者的长篇采访,介绍了作者对蒋介石的认识。国内外许多报刊介绍了这篇文章。

然而,在1985—1986年这一转折点上,海峡两岸仍有不同的声音。在大陆,有人仍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一变化是为国民党、蒋介石“树碑立传”。而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本报记者”写的头条报道中说“张先闻(宪文)虽否认此书(指《中华民国史纲》)与中共‘和平统一’的企图有关……但国内(指台湾)学者也指出,中共恰在此时,出版此书,显然有其统战的意味”,“仍是中共对我(台湾)统战策略一个新的方式”。

历史已经过去二三十年,回顾蒋介石研究的曲折历程,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变化和前进中。

30年来,蒋介石研究到底解决了哪些重大的问题?

2

1. 蒋介石早年是“革命者”还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左”的观点影响,认为蒋介石是革命队伍中的“投机者”。“文化大革命”后,根据史料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蒋介石不是革命的“投机者”,而是在孙中山的影响带动下,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其根据:国内辛亥革命发生后,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与友人张群等,乘船潜回上海,在陈其美的领导下,参加了杭州和上海的光复起义。之后,从1913年春天开始,蒋介石又追随陈其美参加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以及之后由孙中山组织的护法运动。应该说,在革命的早期,蒋介石还是积极地参与了孙中山策动的革命活动。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被迫避往永丰舰。这时蒋介石正在家乡奉化。6月18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说“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权衡时局,决心赴粤“救驾”。临行前,蒋在上海写信给张静江表示,赴广州“非铲除叛贼,誓不生还”,并嘱托后事说“惟对于两儿教育之责未完,吾爱纬儿,思之尤难为怀。惟此不无挂念,如有不测,则请照弟留某之函代行之。”^② 蒋介石到广东登上永丰舰,陪伴孙中山42天。后来孙中山脱险去上海后,蒋介石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述了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斗争,并极力颂扬孙中山。孙中山为该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③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和评价,还表现在孙中山写的祭蒋母文中。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曾离失。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山之自适、山岳之不移。”^④ 在1920年代,孙中山不断委蒋介石以重任,并使其进入革命队伍上层。蒋介石在广东期间,虽然经常与同僚不和,甚至生怒而返乡,但蒋介石在早年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还是作出了贡献。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316页。

② 该两封信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张静江的个人档案中。

③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册,1936年石印本;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1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2.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处理国共关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蒋介石早年并不反共，甚至表示要“以苏俄为师法”。当年，孙中山为了学习苏俄的党务、政治和军事经验，1923年8月曾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蒋介石在1956年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①可是，蒋介石去苏俄访问之后，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对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严厉措施，十分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和恐怖的。因而他说，苏俄与其他帝国主义相比，“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②。加上蒋介石代表孙中山建议苏俄协助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事遭苏俄婉拒后，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他回国后写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始终未见公布或收藏）中，不赞同联俄联共政策。但是孙中山未采纳蒋介石的建议，仍然坚持其联俄联共的既定方针。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积极宣扬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他在《覆张继论党务书》中说：“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廖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公认。”^③他在1926年9月13日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中说：“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义……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④

正是基于蒋介石这时仍然坚持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才有可能出现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可是，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基础，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一批元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国共合作的决策，因而1927年国民党内实施清党政策，蒋介石一批中间力量最终与国民党右翼反共势力合流，不是偶然的。

3. 1927—1937年蒋介石领导南京政府实施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向前迈出一大步。1927—1937年是国共两党激烈斗争时期，双方均以推翻或消灭对方为主要目标。大陆学术界早年曾将这10年称做黑暗统治时期，认为这一时期经济不振、工业萧条、民生凋敝、政治混乱、战乱频发。实际上，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虽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但他整合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其中包括军事和政治派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五院制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实施训政纲领，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合力量，到1935年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在经济上，蒋介石起用宋子文等一批财政精英，进行了金融和税制改革，发展了国民经济。虽然国民政府先后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侵华战争、国内大面积灾荒和反共战争，但至1936年中国国民经济水平仍然达到民国时期的高峰，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抗日战争打下了较强的物质基础。中国大陆学术界在1985年之后逐步改变了过去对这一时期不切实际的认识。

中国大陆学术界曾经较长时间认为在1930年代我国形成了以蒋、宋、孔、陈为核心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动脉。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史学界长时间占据着主导地位，是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一书造成的不当后果。早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我们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但苦于缺乏微观研究。1986年在南京举行的一次民国史研讨会上，作者建议上海社会科学院著名的经济学家丁日初先生向这一观点发起挑战。接着，丁日初先生发表了两篇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重要的且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四

①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31页。

② 蒋介石《致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4页。

③ 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第6页。

④ 朱亮基编《蒋介石言论集》，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第16页。

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一词逐步地淡出中国历史教科书或一些历史专著。

4.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 蒋介石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一如上述,在此再作如下补充。

蒋介石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出生于1887年,当时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形成了他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投身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后,因为陶成章被刺案避往日本,在东京主编了著名的《军声》杂志。在这个刊物上,刊登了他撰写的《发刊词》、《军政统一问题》、《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及《征蒙作战议》等论文。在20世纪初英、俄、日等列强对我国西藏、满蒙等地区怀有极大领土野心的形势下,蒋介石这些论文表现了维护祖国领土安全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早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其以后的政治立场和外交方针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

抗日战争集中体现了蒋介石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不仅在对日政策上,同时对英美等西方国家,也表现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立场。蒋介石一直坚持抗日,坚守抗日阵营。问题是如何看待蒋介石对外的妥协政策,如何看待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和正确评价蒋介石的抗日政策以及战略思想,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为蒋介石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重振中国经济。那时,蒋介石在全国各阶层中的声望达于顶峰。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领导中国走向新的发达的道路。可是,蒋介石未能满足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政治上不接受组建各政党的联合政府,在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再次陷中国于内战的深渊。蒋介石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坚持个人独裁、坚持内战、坚持依靠美国。虽然在风雨飘摇的1948年召开了“行宪国大”,但仅仅有两个小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紧随其后,而抛弃了更多的在野的政治势力,其行宪难以说是真正的国家政治民主化。蒋介石仅仅3年时间即丢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这恐怕是其做梦也未想到的政治结局。

5. 蒋介石丢失大陆,困守台湾孤岛 蒋介石何以如此快地丢失大陆?究其原因,不外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国民党自抗日战争后期退至西南和西北地区后,逐步走向腐败;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现象未有改变且更加严重,从其统治内部严重地削弱了领导力量及其统治基础。其二是国民党、蒋介石丢失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尤其是失去了广大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信任。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多年,但始终忽视广大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关于土地的最强烈需要,而共产党力量及于何地,则及时实施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蒋介石在城市中,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经济陷于萧条、崩溃,人民群众终日惶恐不安,从而使大批工商业阶层和中国政治力量倒向中共一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垮台,成为历史的必然。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并未真正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是从下属身上寻找失败原因,而回避其应负的政治责任。他一直鼓吹反攻大陆,但迅速成为不能实现的空洞口号。国共两党、大陆和台湾虽然仍处于军事、政治的对峙状况,但是双方仍保有联系的渠道。蒋介石不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情怀。当西藏和西沙形势紧张时期,蒋介石默认了中共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赴台后,实施了较为成功的土地改革,打下了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加速台湾经济融入国际市场。蒋介石至死反对共产党,但是他信守一个中国的观念,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是我们对其晚年的基本评价。

如前所述,近几年在海内外特别是大陆和台湾,形成了一股蒋介石研究热。各种各样的介绍蒋介石生平、家世的出版物或描述性的传记小说,充斥图书市场。在台湾民进党执政后期,掀起去蒋化的浪潮,拆铜像,泼污水,当年那个被神化的“蒋公”一时间又变成了“鬼”。历史不能来回翻烧饼,非正即负,两岸的历史教训都很深刻。历史学者试图给人们展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图像,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查阅(准确说,是手抄)蒋介石日记。该日记在蒋介石去世后,由其后人在海外保存多年。前几年交付斯坦福大学保存、整理,开放给学者研究使用。

社会上关注蒋介石,学者们努力寻找蒋介石的各种史料,不是偶然地,是多年来两岸未给蒋介石

以正确解读和客观真实评述的必然结果。短时间内出现各种各样的评论并不奇怪，这是学术研究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我们也应该检视一下，当前许多蒋介石日记片段的刊出，如所谓《蒋介石日记揭秘》等都在社会上造成另外一种效应。一些网友特别是部分年轻朋友，由于对蒋介石缺乏研究和全面认识，而在大力赞扬蒋介石的高尚精神。如说蒋“献身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的失败则是他用错了人”，有的网友说看了日记（实际上看到的片言只语），已经“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说“蒋公可长眠矣！”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学者未能给年轻朋友以正确的引导。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包括研究历史人物，必须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寻找并掌握大量历史资料。通过对史料的考证、鉴别、分析，去伪存真，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科学的认识。研究历史，包括对蒋介石的研究，必须坚持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坚持史料的第一性（即原始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研究蒋介石，首先要寻找有关他的原始材料或说是第一手材料。其中包括日记、书信、文集、档案文件、报刊资料以及与蒋介石相关的各类材料等。

应该说，蒋介石日记是最重要的原始材料，然而它仅仅是原始材料中的一种。日记会为研究者提供传主鲜为人知的各种情况，如传主的政策、措施、态度、判断等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记有较大的局限性，即传主对事物的情感性、主观性、随意性，会影响其对事实的正确判断和真实性。日记往往会有传主情感的发泄。譬如，大家都知道蒋介石与宋子文不甚和睦。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常指责宋子文，甚至讲宋一些十分难听的话。事实上宋子文处理公务的做法和态度并不都错。宋子文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和金融财政，受过较严格的专业训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曾为国民政府理财作出突出贡献。蒋介石用钱常不守规矩，不按财政制度办事，经常写手令要宋子文支付大笔款项。宋子文对此，一次应付，二次勉强，三次坚决拒付。蒋介石大发脾气，坚持要宋付款，从而导致双方不合，甚至闹翻。对此，我们在蒋的日记或书信中看不到有何自责或愧疚。

蒋介石自1923年起，即注重保存个人的手稿文件。赴台后，这些档案先后收藏于桃园大溪乡、阳明山，后转交国史馆收藏。1997年2月正式开放使用。这些档案（合称《蒋中正总统档案》）包括筹笔、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文电、特交档案、领袖家书、文物图书、蒋氏宗谱、照片影辑等9大类。总计4200册，273 000件，涉及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内容。^①它不仅是有蒋介石的第一手原始材料，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如“筹笔”一项，即达17 908件，均是蒋介石处理政务、军事等方面的亲笔函稿、电稿和谕令。这些档案文件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军事大事。据笔者查阅该档案后发现，蒋介石有时一天发出18封亲笔信函或指令，有些是调动部队，提出作战方案的命令。在“革命文献”等类别中，不仅有军政部属的各种报告，还有蒋介石的直接批示等。因而研究蒋介石的生平、军政活动、人际关系等，必须综合蒋档、日记和其他相关历史资料、各相关人物的文献，互为补充、相互校正，才能对历史问题或蒋介石本人作出准确判断和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而目前有些研究性文章，仅仅依靠蒋介石日记，无其他相关材料予以佐证，即对历史问题作出判断，这不符合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不科学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风气，应该引起学者们的警惕。总之，近几年蒋档、日记和各种历史档案的广泛开放，对深入研究民国历史是十分有益的。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繁荣。

责任编辑：刘 莉

^① 见朱文原主编《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台湾：国史馆，1998年，“凡例”。